

20世纪前50年,有多位旅居上海的海宁籍青年画家,其中有商业上非常成功的月份牌画家杭穉英(1901-1947),另外还有当时颇为活跃的蒋孝游(1911-1994)、杨石郎(1915-2000)和徐邦达(1911-2012)。现在除大名鼎鼎的徐邦达为世人所知,蒋、杨两位已渐不为人所知。然而时光倒退七八十年,蒋、杨在上海滩的名声不下于徐邦达,蒋孝游是中国第一部《美术年鉴》的操刀人,杨石郎是海上画坛的青年新秀。三位海宁籍画家都出于海派名师门下。蒋孝游是郑午昌的大弟子,杨石郎是贺天健的学生,徐邦达则是吴湖帆的爱徒。三位海宁籍画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杨石郎“转师”记

唐吟方

社;徐邦达转换了角色,以鉴定家的身份远赴北京,主持国家文物部门古字画收购工作。这里要特别交待一下杨石郎。他从一个普通职员走上艺坛,在当时是个很励志的艺术青年,这当然和业师贺天健的提携扶持分不开。1940年代初杨石郎在海上艺坛初啼莺声后,同乡艺友徐邦达建议转师吴湖帆,给出的理由:贺天健家里只有一些名画印本,而吴湖帆收藏的古代名画多,如果转师成为事实,可以借出来临摹。对于一个初出茅庐求知若渴的艺术青年来说,这是颇有诱惑力的。问题在于“转师”在艺坛是件颇为麻烦的事情,

涉及贺天健与吴湖帆都是闻名江南的画家。涉世未深的杨石郎未征得贺天健同意,贸然“转师”吴湖帆,深深刺痛了一手把杨石郎培养成才的贺天健。贺因得意弟子背叛师门而与吴湖帆反目成仇。这种尴尬的局面延续到1949年后,其后虽经调解,两人表面上和好了,但由杨石郎引起的贺吴裂痕一直都没有愈合。

2016年上海中国画院展出的文献展,展览展示了上海中国画院筹备之初的一些原始文献。在当时名画家提交的院长人选提案上,贺天健就没有提当时呼声颇高的吴湖帆,他提了当时大家都没想到的丰子恺。其中的原因除了贺天健对新中国画院有自己的理想和标准外,不能不令人想到那段由杨石郎“转师”吴湖帆引出来的两位大师间的不愉快。

“转师”在今天看来,影响所及不单是师门之间的矛盾与裂缝。艺术家本

你在,就好了

寒布

墨迹

这精致的
绮丽
这挥洒的
肆意
都只是想去
这凌乱纠结的
心绪
这再也无法梳理的
心迹

神女峰

为了成就这一场
完美的相遇
我石化了这段心事
和自己
当你转身回眸
瞥见我在悬崖边这
遗世的孤寂
你眼中的那一滴泪光
和怜惜
是我在此伫立千年的

全部意义 辜负的祭坛

谢谢你为我抄录的

诗篇

这是最动人的
礼赞
还有你对它完美的
诠释
为此你不惜将自己
奉上了辜负的
祭坛

救赎

为你倾尽了
所有
魂神都已
付出
你的目光里藏着
蛊毒
迷幻了真实的
疼痛和无助
让一切
都在你的爱里
倾覆
而且永远无法
救赎

来因为艺术主张、出身、名声等容易出现隔膜。贺天健和吴湖帆都是海派画坛上响当当的人物。杨石郎由此及彼的经历,伤及贺天健不小,既有自尊颜面,还有体统。“转师”事件在当时社会也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事件中的主角杨石郎,事隔几十年后还被人不断提起,而且版本众多。

杨石郎晚年曾就“转师”事给故乡的一位文史研究者写信,坦露自己的心曲:“当时我第一次画展后常去画苑徐家请教,认为徐(邦达)对传统笔墨艺术有深究独到之处,他们提出转师是为我深造,为我传统精髓拿到手,认为画展中古人笔墨未学到,因此印本解决不了。当时印刷条件盖没有现在高、清楚。”郑逸梅先生提几



夜光杯

句中,似乎皆批评性语句。他认为“我应先向贺明转师”,当然是他天真旁观者言。”杨石郎一再申述当时的本意侧重在艺术,才接受了徐邦达、王季迁的建议。

有一点要说明,吴湖帆染有阿芙蓉癖,他的艺术生活是从一天的晚上才开始的,从师于他的弟子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像杨石郎那样打工者,晚上是无法陪侍老师的。另据杨石郎自述:转师后,吴湖帆仅借过四幅,倒是吴门的大师兄王季迁借临过七八幅古画。

暮年的杨石郎写下这些文字时,大概想把年轻时真实想法告诉给世人,修复由于他造成的历史裂痕,但他的这种愿望恐怕很难消弭画史上真实存在的纠葛,不过杨石郎因此和二代海派丹青名手结下的是是非非,却使他永远留在了关心海上画坛人们的视线里。

今年是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这位有可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曾在上海待过三天,下榻在黄浦路上礼查饭店的304房间。那是1922年12月31日,爱因斯坦可能正在凭栏远眺黄浦江上的越洋巨轮和点点帆影时,意外地接到饭店服务生送来的来自瑞典上海总领事转来的海外电报,通知他获得了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通知是这样说的:“在昨天的会议上,皇家科学院决定把去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您,理由是您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您发现了光电效应定律,但是没有考虑您的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的价值,将来这些理论得到确认后再次考虑。”

有惊喜,也有遗憾。黄浦路是条不寻常的马路,长仅456米,东西走向,西起大名路,东至青浦路。黄浦路本来只是苏州河入黄浦江口北岸滩地的一条纤道,1848年前后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拓建为马路,因其横卧于黄浦江北岸而得名。上海民间习惯称黄浦路为“领事馆路”,因其早年间沿路为各国驻沪领事馆集中分布区,不过后来这些领事馆有的撤销,有的迁移,如今保留下来的只有黄浦路20号的俄罗斯驻沪总领事馆。

黄浦路上最著名的建筑要算爱因斯坦曾经住过的礼查饭店了。礼查饭店,由英国人礼查于1846年创建,是上海开埠以来第一家也是最豪华的西式饭店。1959年礼查饭店改名浦江饭店。我们现在看到的位于黄浦路15号的这栋5层英国式建筑是在1910年扩建定型的,被誉为“上海的里程碑建筑”。该建筑外观为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主立面向黄浦路,2层以上均有挑出阳台,底层门窗为拱形,三四层之间贯以爱奥尼式立柱,并以建筑正门为中轴线,形成对称。整个建筑以一二层,三四层和五层,横向分割成三种情调和风格不同的层次,仅窗户的装饰细节就能看出礼查饭店的不同凡响,整个建筑让人感觉凹凸面多且深进大。

这栋建筑的历史值得大书特书:1867年,在上海最早使用煤气;1882年7月26日,上海首次试燃15盏电灯,其中7盏就是在这里亮起的;1883年这里成为全上海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地方;1901年中国第一部电话在这里接通,礼查饭店的电话号码为“200”;1908年6月9日,西方半有声露天电影首次在这里亮相。而最有意义的是,1990年12月19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浦江饭店孔雀厅挂牌成立。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爱因斯坦也擅长炒股,资料显示他20年间,其购买的股票由数千美元涨到了25万美元。这丝毫没有影响他拿诺贝尔奖。当然,也有因股价一上一下,心亦随之的。前几日读郭振铎日记,其中记载了这位大学者也曾“购股票若干,亦姑试为之耳”。不过老郭忽然发现为了这几手股票,此后的几十天里成天奔波于学校与股市之间,忐忑不安,忽觉生平未曾有过如此之得失萦念,于是把手头股票一抛了之,回家“取善本书若干,以资欣赏以涤尘心”。

想过点好日子,挽起裤管,抬脚探探水深水浅,无可厚非,但要放松心态,有惊喜自然也会有遗憾,不能被这些上上下下的数字掌握了生活。如今的黄浦路15号已经成为了中国证券博物馆。

让人喜忧参半的黄浦路

沈琦华



披着薄雾的景 (纸本彩墨) 李翔

北宋元丰二年(1079),神宗在位,时苏轼44岁,这时,朝廷中有多人弹劾他的诗里有对皇帝推行变法的讥讽语,甚至说罪该斩首!帝以其“谤议朝廷”颁旨逮捕在湖州任太守的他到京,关押到御史台监狱,这里有许多柏树,是乌鸢喜栖息处,故史称“乌台诗案”。

当时苏轼面临死可能,还是已经赋闲的王安石上书为他说情,特别是太后曹氏也为其之辩解,这使苏轼得以解脱,调去黄州(今湖北黄冈县)监住,后任团练副使。不久,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起用他任“翰林学士”,但却因反对全盘废除新法,又贬惠州、海南等地。其曲折的官场遭际,正由于他耿直、坦率,胸无城府,所以时常触礁,处处波折而常处流放之中。

诗人在流放的逆境中充满乐观的情绪,以不安定求安定,寻找平常生活里的简单的快乐。这正如他的名字“轼”(古人车前横木)追求的只是普通、默默无闻和简单实用。他的《谪居三适》诗以晨起理发洗头,中午午睡,晚上濯足为“三适”,在谪居中,以一片光明心安然于非梦非觉的境界中,对窘困失落的贬官生活泰然自若。他反感不劳而获,《余米》一诗说:“不缘耕得,饱食殊少味”,认为只有自食其力,才能无愧于心。

作为惠州的《蒺藜菜》虽衣食不周,却能不以为意,并自种蔬菜,其诗“题记”说:“吾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夜半醉,无以解酒,辄蒺藜菜煮之,虽肉不能及也。”可见他有安于清贫、热爱平凡生活、以苦为乐的精神。

苏轼在谪居海南时,还曾创制一种青菜汤,因其味佳人称“东坡汤”(苏轼号东坡)。诗人还自述种植稻谷之事(见林语堂《苏东坡传》引文)。苏轼流放处处地偏远,大多很闭塞落后,没有开化,故有溺婴烹食之蛮俗,对此,他发动地方士绅以“救儿会”名义向富人募捐钱粮款物等捐给贫困村孕妇育儿之用,使变卖婴儿之风得以改变。

苏轼逆境三适

卢润祥



“我的名字叫国庆”征文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之日将至。我们每个人都有与祖国相伴的故事,而如果你,或者你的朋友名字有这样的特点——叫“国庆”,那么,欢迎投稿来讲讲名字背后的故事,讲讲你们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故事。来稿限1200字以内。

投稿邮箱:shijl@xmwb.com.cn
截稿日期:9月27日。

“永久”标识标牌演变史

朱钟炎

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号称“自行车王国”。作为领头羊,是产量、质量、品种、知名度、历史悠长度占据五个第一的生产永久牌上海自行车厂。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初期华东工业部上海制车厂生产“扳手”牌,象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特征。当时商标运用谐音的手法比较流行,以白熊和地球为图案根据“熊球”的谐音为“永久”牌。由于白熊和地球感觉沉重没有轻快感,于是很快就取消了该图案,在工业部部徽内加上“永久”两字(1951年元旦起)一直用到1956年。之后“永久”自行车厂委托上海美术设计公司进行logo设计业务。

1955年,一机部提出设计标准定型自行车(简称“标定车”)。当年底,上海自行车厂率先试制成功28英寸PA-11型“标定车”,体现了我国自行车

规格由英制向公制全面过渡的起点。当时永久厂搞了新老产品零件对比展览会。许多职工提出了能否设计一个与永久自行车相媲美的永久新商标,脱离解放初开始使用的“永久”等线体美术字框。伴随着11型“标定车”的诞生,永久新商标也呼之欲出。

当时上海自行车厂还无专职的设计人员,计划科有个职员邵再生,平时爱好美术,因此厂部就调他担任设计工作。标定车试制成功后他曾经构思设计了许多永久商标图案,但都不理想。厂领导支持他去向上海美术设计公司的专家学习请教。当时专家也设计了不少方案,均不理想,专家也打起了退堂鼓,设计

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一个偶然机会,邵再生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个字体设计图案,即将字体巧妙地组合成有趣的形状,邵再生由此获得灵感,设想出以自行车为构图基础的设计思路,并向上海美术设计公司的张雪父先生作了介绍,两人一起反复推敲了许多构图,最后一个以自行车象形体为构图的永久商标完成了。由于只有永久两个汉字演绎为自行车造型的图形没法做成车标牌,也没有装饰性,于是由上海美术设计公司装潢设计室副主任倪常明先生设计了车标牌(1957年):上为齿轮,下为稻穗,分别代表工农大众;中间上为闪光的五星,车形

的永久两字镶嵌在中间,下面为地名上海。这个设计其实沿用了国徽的构思构图。

以后由于该车标与国徽相似度太近,不适合作为商品的商标,所以1976年我设计了体现改革开放新时代风格的商标车标牌代替了国徽风格的商标牌。由于国徽风格的商标牌原有的用户品牌印象比较深刻,新标牌风格与老的标牌风格差别比较大,对于品牌的形象延伸有一定影响,因此厂方考虑吸取原来国徽风格红底白字的醒目特征,重新进行设计调整,于是我又设计了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具现代感的永久商标牌(1980年),一直沿用至今。

十日谈 请看明日
上海货与设计师 本栏《七十年
责编:林明杰 代流行过的年
历片》。